

©2017 by 本土研究社  
All Rights Reserved

為要活出日本的理想，請先將這個國家埋葬！

（前東京大學校長、矢內原忠雄〈國家的理想〉，一九三七年刊於《中央公論》）

看上帝份上，頂住！向前衝！

（法國詩人夏爾·沛吉前額中槍，死於戰場前的最後一句話，時為一九一四年）

一 生之欲

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! 過不一樣的生活，從頭肯認身體、欲望、情感的功效，以至躍入生命深淵，考掘一切意義……凡此種種，乃新世紀流行的福音與瘟疫。無論是另類生活實踐者、New Age 的靈修禪修者、消費主義的抵抗者，還是積極介入公共的世界公民、政治異議者、生態保育者，甚至沉思萬物的詩人和前衛藝術家，都向我們宣告：「改變你的生命！」儼如一道懸於星空、感召心靈的律令。隨之而起是許多耳熟能詳的詞語和概念，穿梭坊間日常（生活品味、生存美學、人生體驗）與學術市集（自我技術、生命形態、生命政治、欲望機器）之間。幾億光年而來的星塵眩目，佈局出此時此刻。

不過，改變生命即是要改變什麼？具體來說又是一種怎樣的改變？這改變帶來什麼意義、後果和價值，值得我們押上思想

的注碼？這些問題難免空洞——假如改變生命的同時，我們看不到世界也在改變。如果思想不欲陷於某種庸俗的生機論，沉溺於動物性的變異生成，甚至等而下之，困於各式勵志心靈同時亦塗炭生靈的 post-modern 意識形態；如果我們要思想真正意義下的「改變」，「生命」的改變就必須以「世界」的改變為前提<sup>1</sup>。那麼，我們應疾呼「改變世界」了？

並不在世界以外。所謂「人」總是存活在世界裡，並與其中一切事物共存，互為係。也許，連「改變世界」這個說法都夠，我們還要思考「世界」為何，如何生，因為世界的改變總是發生在世界裡的一邊廂，我們正著手改變世界，另一廂卻是世界（藉著我們的努力）對自身的重新創造。思想？思想遊蕩此兩塊區域之間；這一道例外的間隙，永遠是思想歸屬的領土。

## 二 如無意外：暴現眼前的災難與慶典

如無意外，距香港只一百三十公里之遙的台山核電廠將於來年投產，其風險問題成

為近日一個話題，亦大概止於話題。而今年正值切爾諾貝爾事故三十周年和福島三一事故五周年。「核事故」不單是現實一部份，對很多人來說，它亦命名了人類當下的生存境況。自從「核事故」暴現眼前，人類的工程技術和系統建設，一律以偶發的事故/意外為構成自身的界限<sup>2</sup>。

我們都知道，核事故一旦發生就不會輕易完結；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外圍亦加建了新的「石棺」來控制沒完沒了的輻射擴散；New Safe Confinement (NSC)。一場不可逆轉的災難，如今獲取了不同以往的表现形式：一種能夠頂住核擴散、具實質功效的景觀建築，兼備紀念碑記憶的功能，從感官上將災難的內部與外部重新編配。NSC 作為應對災難的「現代」技術，首先帶來的效果竟然是再現了「前現代」的知識零度與空曠，有如傅柯 (Michel Foucault) 在《臨床醫學的誕生》所言，在臨床醫學體制與知識結構尚未出現時，「可見之物既未能言說，亦未能傳習」<sup>3</sup>。此豈非當世困境之隱喻？預算 NSC 可將這場無法徹底解決、輻射式延展的災難，安全地圍困至少一百年；期間，災難的真實只能座落於可見與不可見之間，停

<sup>1</sup> 勿忘記……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 (Martin Heidegger) 說過，只有人「擁有世界」。「形塑世界」(world-forming)，動物則不然。雖然動物不如石頭 (對石頭來說，並無世界可言，石頭是 worldless 的)，但動物至少是匱乏於世界的 (poor in world; deprived of world)。換言之，對動物而言，世界並無揭示為一個個分別存在的事物，牠們並不懂本體性的差異。參 Martin Heidegger, *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: World, Finitude, Solitude* (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95), 185-200。

<sup>2</sup> 參 Paul Virilio, *The Original Accident* (Cambridge: Polity, 2007)。

<sup>3</sup> Michel Foucault, *The Birth of the Clinic: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* (NY: Vintage Books), 51。英語譯者 A. M. Sheridan Smith 在譯文中寫：The Visible was neither Dichele nor Dachele。

駐於一種有待全新知識來重構的 In-visible 狀態。裝箱上 NSC 的切爾諾貝爾，係一副器官構造未明的軀體。單獨來看，核電廠及其廢墟，可謂一片空無，無可揭示。「切爾諾貝爾」的名字只能指向某場蒙昧的天啟。

正當一九八六年四月距離我們無限遠之際，一場更高維度的核災難就發生在福島不遠處。在後者的輻射照明下，前者的混沌反而逐漸化開，得以暴露。南希 (Jean-Luc Nancy) 寫過本平易近人的小書，融匯他近廿年來的哲學題旨，可謂一篇後福島世界人類命運的診斷書，展示了哲學家面向災劫時應有的身段：命運不可算計，但可以思想。按其診斷，今人之存正暴露於一場將一切統合的「等價災難」(Catastrophe of equivalence) 之中<sup>4</sup>。這不是說一切災難都是等同的，而是說從今起（或更早已開始），一切災難、戰爭、危機、事故，及看似其反面的秩序、安全和治理，都緊密連繫於由「一般等價物」(general equivalent；馬克思用以分析「貨幣」的觀念) 所構成的總體架構裡；在這個架構裡，不但事物間建立了一般的牽連，人類以至世界的所有存在都面臨被其

吞蝕的命運。南希強調，真正災難的並非事故本身，而是這種等價交換所構成的總體；世界變成一場一般化的災難，不再具有真實的意義。

在此值得一提，等價的世界本來就可以非常多元，並不必單調。文化多元、身份差異、個體的獨特性格、多樣化的市場選項，凡此種種均可在等價的「一」裡得到肯定。數學家夏特勒 (Gilles Châtelet) 指出，「等價」、「多元」、「混沌」在越益金融化和網絡化的資本空間操作裡，其實互為彼此。是故南希筆下一場「災難」，夏特勒形容為「慶典」，一切思想在其中都沒有價值<sup>5</sup>。

以上診斷闡明了福島（和切爾諾貝爾）於當代的意義：我們身處一個沒有思想、亦無法構成意義的世界。南希說，困難的確無法解決，至少無法單單以改變個人生活方式，或通過改善核能技術、停用核能、開發另類能源等方案來解決（當然，這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探究和研發以上可能），因為真正的「災難」已遠超核問題本身而蔓延至所有事物，核事故甚至只是這場災難的其中一顆結晶。問題無法用一副

<sup>4</sup> Jean-Luc Nancy, *After Fukushima: The Equivalence of Catastrophes* (NY: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, 2015). 原文書名的正副題互換，可見原來題旨所在。在此一提南希另一著作（合著），與本文略有關連，可作參考：Jean-Luc Nancy & Aurelien Barrau, *What's These Worlds Coming To?* (NY: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, 2015)。

<sup>5</sup> Gilles Châtelet, *To Live and Think Like Pigs: The Incitement of Envy and Boredom in Market Democracies* (Falmouth: Urbanomic / NY: Sequence Press, 2014).

石棺埋掉，遑論化解。當然，這不一定是100%壞事，只要我們擺脫惰性，開始思考……

無法構成意義的世界……或者這種意義無效的狀況，嚴格來說已經很難說成是一個正常的世界，特別當所有可稱為「世界」的結構都應該有其普遍通行的邏輯，以致「一物事物能據此建構出各式關係和意義。這進一步引發更多問題：什麼「世界」？世界如何喪失？能否復生？這些問題何意切？

### 三 《世界》

什麼世界？

讀者可以將手上這本《世界》看成文集、雜誌、學術期刊，但無論從出版形式抑或內容來看，《世界》並不完全是以上任何一項。我們的目標是出版一份兼顧現實分析和理論建築的刊物，以此為跨域平台去組織一個由本地出發，連結東南亞鄰域的知識社群。《世界》盼望能建造一個有韌力傳習過去、不斷積累，同時又勇於籤破成

規共識、創造新問題新觀念的知識傳統；一個「求新」的「傳統」，似乎是個帶來麻煩的悖論，多於是解決鬱結的答案。然而，這個充滿張力的提案正建基於一個診斷之上：我們在思想上的闕如和匱乏，在於未能同時具備耐心連結過去的韌力，和猛力撬開未來的勇氣。既不迷戀未來主義的前衛和虛無，亦不擁抱歷史主義的安舒和犬儒，因為過去和未來都必須以當下處境為辯證。在這個原則下，不單止「世界」，連「香港」本身都必須懷疑，才能構想出全新的問題和介入。

官方話語裡，香港一直是知識型國際都會；而此地亦的確有一種由來已久的大學戀物癖。這城市樹立多所大學，當中不乏亞洲甚至世界排名遊戲的優勝者，不少研究發表於海外重量級學術期刊；但在一系列知識生產、累積、宣傳和販賣的過程裡，香港自身的處境並非學者們關注的對象。關於「香港」（作為一獨特的政治經濟構成、詭異的時空間經驗、失落於歷史的幽靈乍現……）的研究，在英美主導的學術市場裡並沒有吸引力和話題性。要在各種海外期刊發表論文，藉著相互引註以增加學術影響力，研究者必須擺脫狹隘的

地方視野，而這對於「大學」這種面向國際的制度組織而言，其實亦自然不過。因此，並沒有「在地的大學」、「不離地的大學」這回事。大學作為將知識普遍化的社會機器，並不需要理會「地方」作為新知識得以發生的原初條件何以重要，甚至對牽涉其中的偶然性予以根除。而我們則正在面對一個與此相關的兩難處境：大學生產的前緣知識，包括各種分析、理論、假設和發現，要不以脫離歷史脈絡的模式粗鄙挪用於本土，要不就直接被本土匯集為離地的玩意；更甚者，這種對當代知識的直接破壞或厭惡，一再生產和強化中心與邊緣的對立模式。無論如何，兼具創造力、顛覆力和構造力的真實知識，「與本地無緣，遑論進一步建立具「地方」[「反抗」]性質的知識傳統。」

《世界》是針對以上情勢的回應，而這個回應顯然不為單純回到一個已有的、想當然的「本土」，以後者為我們唯一的生活世界 (Lebenswelt) 來判斷一切問題 (並將其他思考視為離地)。眼前要思考的，反而是就著「地方」、「在地」、「本土」，以至 place, locality, situation 等詞彙，發明新的問題，重新構想「地方」與「世

界」的關係。此當前急務又與本期《世界》主題息息相關：究竟世界的界限/極限 (limit) 何在？我們如何能夠在界限/極限上思考？

#### 四 浮世衰頹：張力消逝的世界

當我們將本土經驗和利益看成我們唯一不可轉易的生活世界時，這個「本土」便要倚賴「邊界」(boundary) 來維繫，因為我們必須先確立自己與異己的分別。然而，「邊界」和「界限」是兩個需要區分的觀念<sup>6</sup>；可以說，《世界》要做的正是令關於「香港」的思考，從「邊界」的網羅和圍堵裡逃逸而出，並將之切換成以「界限」為基礎。為此，本文嘗試就當下處境，提出三種可能世界的假設，而這些世界都有其相對應的知識。

##### TYPE I

第一種世界 (TYPE I) 與今日我們身處的消費社會並行，進而共謀，是一種強調多元、差異和個人自由，充滿選項和「可能性」的世界。TYPE I 的世界有如上文提到

<sup>6</sup> 關於 boundary 和 limit 的分別，如何以拉康的精神分析話語闡釋，參 Slavoj Žižek,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: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(London/NY: Verso, 1991; 2008), 109-112.

## All Rights Reserved

的「災難」，是以一般等價律來維繫的一場巨大慶典。在金融資本的廣泛流通下，欲望朝向全面商品化，社會關係則全面去政治化。階級之間的矛盾在 TYPE I 並不適用（被掩藏），或被迅速轉移為多樣化的文化差異和身份選項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就連「世界」自身亦岌岌可危：本來意義充盈的「世界」，早被改造成全球化下的「環球」(globe)<sup>7</sup>。資本藉著大幅員地擴張其內在空間，將世界吞噬，且能夠決定其中所有生命形式。一個近乎 worldless 的世界——我們可稱之為失去肌力與張力 (atony)<sup>8</sup> 的「浮世」。與 TYPE I 對應的是一種商品化的知識：相對化、服膺於等價律的知識。一切普世主義的宣稱和計畫均遭到厭棄和批判，並由媒體上高速增生、繁殖和分裂的紛陳意見、想法、對話、辯論所取締。知識只是用來審視事物的不同視角、話語和詮釋，它們在論述市場上相互競逐資本，以實效或時尚取悅聽眾。表面相異的知識話語亦不一定相互排斥，也可以共享同一個世界，眾聲喧嘩。這種知識的地方性格是游移和浮動的，

它不斷向鄰域異域伸展，甚至「去疆域化」；通常展現為對文化差異和身份多樣性的追求。

## TYPE II

從表面看，第二種世界 (TYPE II) 幾乎是 TYPE I 的背反。如果在浮世裡人只能做一根浮草 (uprooted) 的話，在 TYPE II 的世界裡，人不但要求紮根 (rootedness)，還要將文化植根昇華為政治行動的基礎。這是個身土不二的世界，唯本土者可以存留。浮世給予個體的是繁多選項之間自由放任的逾越和愉悅；反之，在唯本土稱是的「TYPE II 世界裡，「多元」會化約為兩極化的「二選一」。同一場面反覆出現，延展向所有日常區域，弔詭地呈現出網絡的形狀；欲望朝向全面網絡化。身處其中的人必須選擇。不是多項選擇題，而是嚴肅的決斷時刻；不只是 choice，也是 decision。個體不單要抉擇，亦要承受隨抉擇而來的後果<sup>9</sup>。這些抉擇經常牽涉到「生存」問題——即使未必每次都立即與自身生死存亡有關，亦最起碼關乎外來者對自身利益構成的威脅，催生

7 Peter Sloterdijk, *In the World Interior of Capital: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Globalization* (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13).

8 此處參考「巴迪烏 (Alain Badiou) 對 atonic worlds 的描述。見 Alain Badiou, *Logics of Worlds* (London: Continuum, 2009), 420-422。

9 海德格在一次演講中，將這種全面遍佈於生活大小角落的決斷狀態宣告得清清楚楚：「從即時起，所有單一事情都要求決斷，所有行動都要求責任！」

自我保存 (self-preservation) 的強烈欲望。在神經兮兮的 TYPE II 世界裡，社會關係必然朝向泛政治化的方向（相對 TYPE I 的「去政治化」），當中敵我之分猶為關鍵，過程可能滲透著抑鬱、恐懼、罪疚、躁動、憤怒等糾結的複合情感<sup>10</sup>。由於敵人及其威脅（先不論真實抑或虛構）總是臨近眼前，此處長久瀰漫狂熱的氛圍、言辭、幻想和對立；借用某本土學人的診斷，我們將 TYPE II 稱為「鬱躁」的 (manic-depressive) 世界。

與 TYPE II 對應的知識，當然不可能建基於公共域的多元話語和共識溝通；也不可能實現一種客觀的倫理規範。反之，這種知識帶有強烈的主觀願望和優次取向；它亟欲通過一個二元對立的結構，為備受威脅的生存境況重新賦予秩序。這種知識有明確的本土性格 (nativism)，可構作集體的政治行動，並且能夠自動再生產出共同體與其外部之間的邊界，有如機器一直重複同一習作。要注意，這裡提到的「外部」，並不一定處於地理意義上的邊境以外；在全面都市化的

今日，這些異類也可以以寄生的方式蔭居於宿主體內，甚至被宿主主動納入共同體內部加以治理。由此可見，這種本土知識往往被某種已給予的位置法則所支配——這點容後再談。

不難看到，今日香港正由 TYPE I 走向 TYPE II，知識亦由一種強調流動的多元文化論，轉向唯本土論。兩種知識的實踐者經常處於對立陣營，前者被扣上「離地」的帽子，而後者則動輒被控告為「右翼」、「法西斯」（當然，所謂的本土派不必然是右傾的，本土陣營亦同樣可以佔據政治光譜上的左端；這在議會民主的語境下尤其常見）。某程度上，對立兩者一銀兩面，互為裡外，彼此依附存在。如果硬要說一種本土為先的知識比另一種強調文化多元的知識「進步」的話，亦不過因為前者比後者稍為「適時」罷了：就赤化而來的恐懼，以及社會關係上持續惡化的不平等，前者比後者更為直截地提供了一個易於理解、簡便且可操作的提案。

然而亦必須指出，當我們以「改變」為思考問題的前提時，TYPE I 的知識的確是不相干的；它甚至系統地抵制了改變

<sup>10</sup> 這些情感寄生於 TYPE II 的整體結構內部，要將之從中剝離是不可能的。也可以說，指出個別情感如何不符「理性」，在分析上並無用處，因為前者正是這個身體結構的節奏，賦予其特定的時間感。關於情緒和情感作為政治因素的討論，在當代哲學和政治理論裡一直佔據重要一隅；如今要分析本土政治，更是不可或缺。

出現。純粹多元跟改變是兩碼子事。改變」意味著某事物關係組成的舊秩序，被瓦解及更新成另一新秩序；當中必然牽涉到一個跨越界限的運動。但多元社會無論如何多姿多彩，一再生產出時尚與品味的替換和轉變，本質上仍然是不動、總體化的「」。資本主義的繁多，表面是混沌失序的「自由」，其實是一個堅固的籠牢；藉著秩序的放任和衍生，資本得以擴張、流動和變形。如歷史學者伍德 (Ellen Meiksins Wood) 所言，與資本並行的多元 (相對差異的繁衍) 並不真正認知差異本身，只有後者有助我們思考根本意義上的改變。本於「多元決定」和「主導權爭奪」的身份政治，或可壯大市民社會，卻無法處理核心的階級矛盾。嚴格來說，「階級」鬥爭的產物，並非尋常的身份選項；而階級平等亦不同於其他身份如性別或種族的平等，因為前者意味資本主義體系的揚棄。更甚者，多元身份政治亦容易淪為商品拜物教的極致<sup>11</sup>。

無論是否同意其歷史分析和觀點，伍德將混沌多元診斷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症狀，有助我們明白，何以越係生機處處浮世，越瀾漫物哀之氣息。此牽涉到浮世衰頹

(decadence) 的現象。香港的文化衰頹與墮落，並非源於現代道德淪亡，亦無關乎傳統式微不興，而是政治不行與經濟狂飆兩者交互而成的弔詭局面。借用亞巴斯 (Ackbar Abbas) 妙語：不是 doom and gloom，而是 doom and boom<sup>12</sup>。「衰頹」意味著單一向度的發展，將本應開放的政治處境情勢，僵固為一個封閉的社會場域；而弔詭處正在於選項越多，流變速度越高，該場域則越為封閉。Doom and boom，災難與慶典。

## 五 鬱躁的節奏：歷史受阻離的世界

若此無力世界的衰頹本身就是一道律令，禁止世界任何改變；若此為必須克服的難題，那麼由 TYPE I 走向 TYPE II，又是否覓得改變及其界限？經過約莫十年不同意義下的本土運動，「本土」漸漸變成許多人生活的優先甚至一切；本來在殖民年代不成氣候的「本土」，如今虎躍而成最逼切、最炙手可熱的政治命題。這種實踐模式的切換，豈非具體意義下的「政治」？

本土政治頑固地尋求地方身份認同和歸

<sup>11</sup> Ellen Meiksins Wood, "Civil Societ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" in *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: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* (London/NY: Verso, 2016), 238-263.

<sup>12</sup> 伍德堅定不移將自身置於歷史唯物論的立場，延續了分析派馬克思主義的傳統。她一向敢於就各種關於資本主義歷史的常識，共議和假設爭辯。於1991年出版的名著 *The Primitive Culture of Capitalism: 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* (London/NY: Verso, 1991) 即為一例，書中她以嶄新角度分析英國作為資本主義發源地的歷史條件，辯證地重審資本在英國展現的原文化精神，反對學院傳統傾向以法國經驗（「布爾喬亞範式」）來「自然化」資本主義的歷史。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立場堅定的她已著手抵抗以「身份政治」為代表的左翼文化潮流。伍德剛於本年一月逝世，在此特為記念。

<sup>13</sup> 正如港英管治時期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笑話，「雖然沒有民主，但我們有自由！」我們當然知道，從殖民而來的「自由」首先必須是資本的自由，然後才是市場裡頭的自由。借鄧小平的話，這種自由毋用思想解放，只顧實事求是。有關 decadence，參 Ackbar Abbas, *Hong Kong: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* (HK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1997), 4-5.



All Rights Reserved

屬（例如將香港視為久經數百年演化的海洋民族，或以華夏文明及其遺民為基礎的洋城邦），並以此作為行動基礎去擬定策略，一再生產種種知識話語。「身上不二」並非宣傳咒語，而是一地方／位置歸屬的法則（law of place）。在唯本土論裡，事物都通過「歸屬與否」來操作；只有歸屬本土者能夠獲得肯認，其他未能歸屬者則一一否定、抑制、拒斥，或在一定條件下予以同化（assimilated）。當「就算存在同化的可能，始終不變仍然是「歸屬與否」的首要界線，正敵我之間並無中間項；同化的操作，反而過來突顯本土的優越與優先，而社會關係趨向平等」<sup>13</sup>。因此本土政治的一種關於位置編配（placement）的知邏輯操作。由失序多元到鬱躁二

「地位」，而這也許製造了世界正在改變的錯覺。然而本土主義所強調的兩極，是預先給定的身份對立，本身極具重複之能事；當中「本土／異己」這組選項（例如：敵／我、人／鬼）是不會轉化和提昇的，位置編配過程自身既不生產其他選項，亦無空間容讓第三項來中介。每次出現或有不同，但同一組選項只會重複出現

眼前，要求抉擇。鬱躁世界裡只有同一個二元結構不斷重現，而沒有新事物暴現的可能（前者杜絕後者）；是故本土政治並無穿越新舊秩序之間，其自身甚至禁止了界限的思考。

如果不只將「鬱躁」視為一任意描述，並大膽假設這個出自本土陣營學者的隨心用語，在命運的偶然下竟準確地命名了一個世界的精神結構的話，則我們對本土政治可以有更多悖於常理的洞見。來自拉康學派的精神分析師列特（Darian Leader）對鬱躁精神病素有研究，有助入門<sup>14</sup>。在精神分析的診斷分類中，鬱躁在臨床結構上屬於精神病／psychosis（而非較為「正常」的精神官能症／neurosis），用以定義的特徵是「阻離／排除」（Verwerfung；foreclosure）：意指精神病主體被「囚」於符號界（the symbolic）之「外」。這一點看來相當弔詭。如果將本土主義的出現看成是符號秩序得以重整的契機，或許是個美麗的誤會，因為鬱躁世界所呈現的理應是符號界（語言域，或曰「大他者」）的失效。然而，跟同為精神病的妄想（paranoid）和精神分裂（schizophrenia）相比，構成鬱躁的阻離亦具有其自身的

<sup>13</sup> 多年前巴理巴爾（Étienne Balibar）分析法國本土的新種族主義（neo-racism）時，經已提出相關觀點。參 Étienne Balibar & Immanuel Wallerstein, *Race, Nation, Class: Ambiguous Identities* (London: Verso, 1991)。另外，關於本土派論述的批判和分析，參今期《世界》戴遠雄：〈公民性格的政治：檢討本土派的民族和文化論述〉，此處略去重複的相關觀點。

<sup>14</sup> 拉康延續了佛洛伊德的傳統，在關於精神病（psychosis）的書寫和研討課上只集中討論妄想精神病，對鬱躁病則著墨不多，列特在這方面發展了拉康的理論。參 Darian Leader, *Strictly Bipolar* (London: Penguin, 2013)。另外，精神分析的診斷傳統，與主流以 DSM 為規範的做法不同，前者拒絕以統計學上症狀的集合（cluster of symptoms）來分類精神病患，主張首要應探問症狀背後的基本條件和結構。正因如此，站於要為一個「世界」提出批判及臨床（critical and clinical）分析而言，精神分析（相比起以 DSM 為診斷規範的心理學和精神醫學）可以給予意想不到的介入點。

獨特性。在此僅提以下幾點，以助我們重新認識 TYPE II 的界限，以至第三個世界的可能。

拉康 (Jacques Lacan) 提過，精神病患者具備一常人罕見的特質：對事物意義的確定（而非懷疑）。然而，鬱躁者對一樣事物卻是難以確定：責任。觀乎近年本土傳習諸勇武者建國者所言所行，這點似乎不難理解。我們都聽過，處於躁狂狀態的往往可以在言語、性交、金錢、暴力各方面做出各種不負責任的行為。然而，對責任不確定，不等於對世界和他人冷酷無情，反之，躁狂者看似不負責任的行為背後，也可以隱藏著令人大惑不解的激情：勇於犧牲小我成全大我，願意付上巨大代價去拯救正在崩塌的世界，甚至為「真理」而戰<sup>15</sup>。躁狂者對責任的不確定，反而見於他們在語言域內的隨便和任意，例如無法自控的「言語奔逸」(flight of words：於字詞或語音之間編造大量連結)。本土派慣常的言語短路、鍵盤狂熱、左右亂走，在在展示出以上特質。問題不在於言語解離，無法溝通，而在於過度連結。要生產出意義，就必須同時建立和壓制 (inhibit) 不同字詞間的連結；沒有壓制，只有連結

的話——when everything is connected——整個意義生產的系統便與癱瘓無異。在欲望全面網絡化的鬱躁迴音室裡，言語過熱 (overheating) 令意義難以組織<sup>16</sup>；忽略這一點的話，思想便無從介入。

與此相關的是鬱躁者在思考和實踐上無法掙脫的強制「重複」。由於沒有「大他者」作為符號秩序的有效中介，精神病患者有如被「囚禁」於想像界 (the imaginary)，呈現出種種辯證上的惰性 (inertia)：即使精神病的世界存在本來可構成意義的元素，精神病主體並沒有能力去發展、轉化、切換以至逆轉這些元素，而只能不斷重複言說相同事物。同樣情況亦發生在鬱躁者身上。列特指出，雖然被稱為鬱躁症，但抑鬱和躁狂只是表面症狀，而鬱躁並不只是兩類症狀相加或相互交替那般簡單。假如精神分裂者的惡夢是自我的解體，對鬱躁者而言最可怖的夢魘則是大他者的解體；故此，抑鬱與躁狂之間的擺盪，很可能是患者所倚賴來重建秩序的方法（而非問題本身）。鬱躁者亟欲通過建立雙極性格 (bipolarity) 來重新掌握生命的「亂狀」：世界被切割成兩個黑白分明的極端（好與壞、真理與邪惡、忠誠與

背叛、貼地與離地……），二者必須保持純粹，造成分離和對抗的格局。兩極化的鬱/躁，不單是兩種情感（或情感失控的狀態），而是一種特殊「理性」的原初表達。只要鬱躁者一日仍困於想像界——自我循環和倒置的鏡像世界——bipolarity 便會一直是他/她的不二思考方式。由於無法進入有效的辯證過程，鬱躁者只能以二元極端對立的結構，來賦予生活最低限度可掌控的秩序；而當患者只有兩極的對立項，而沒有第三項的介入時，一切就只能重複下去，沒有轉化的空間。鬱躁世界裡的元素無法進行任何辯證的重組 (re-composition)。此即現時本土政治的二元對立思維。問題並非敵我關係的存在，而是敵我關係的存在必須是唯一的政治操作；問題並非自保本身，而是自保與自毀所構成的兩極性格。此乃鬱躁者的生存之道。

最後，我們要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：究竟鬱躁者面對怎樣的「亂狀」，令自己要終日擺盪於兩極而無從脫身？列特其中一個臨床洞見來自對鬱躁混合症狀的觀察。有患者曾經表示，他/她所經驗到的遠非鬱躁兩者往返交替那麼簡單，而是

訪談

馬國明

著名民間學者，時事文化評論人，前曙光圖書公司老闆，現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。著有《路邊政治經濟學》(1998; 2009)、《班雅明》(1998)、《全面都市化的社會》(2007)、《雨傘擋不住的暴力》(2013)等。另著有長篇小說《歐洲12國16天遊》(2013)。

吳介民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，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，「守護臺灣民主平台」成員。研究領域及興趣包括政治社會學、政治經濟學、中國政經社會變遷、臺灣民主化。著有《第三種中國想像》、翻譯《反動的修辭》(The Rhetoric of Reaction) 等。

張少強

社會學家、民族誌者、網路書籍《香港社會文化系列》編輯、學術期刊《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》編輯。從事香港研究，透過尋繹社會歷史、地方事故和常人事跡，反省(後)殖民主義、(後)冷戰格局、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。近來著有《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》(2015)、《管治新界：地權、父權與主權》(2016)、編著《香港·城市·想像》(2014)。

香港民間學院

由一群推動民間知識生產的年青學人創立，透過定期策劃各社會範疇的課程，旨在凝聚本土知識社群，深化民間的知識創造力，介入社會關鍵爭議。

作者

陳錦輝

《世界》編輯

戴遠雄

比利時盧汶天主教大學哲學研究所

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社會與政治轉變研究所

彭依仁

運熟七十後，畢業於國際關係，卻也鍾情於文史哲，寫詩，也寫書評，現為圖書館職員。

黃杰

自由撰稿人，學術翻譯和校對。

攝影

Zorani Poposki

跨界藝術家。居於香港和馬其頓史高比耶 (Skopje) 兩地，曾參與六十多個國際展覽和藝術節。在其公共藝術項目、表演和數碼版畫作品中，積極探索邊緣性和身分等主題。Poposki 曾為 CEC Artthink 得獎人，擁有文化研究博士、新媒體藝術碩士學位，並著有一本關於公共空間藝術實踐的著作。

Eddie Tay

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副教授，教授創意寫作和詩，曾獲 2015 年新加坡文學雙年獎。為了尋找寫詩的靈感，以傳統菲林相機捕捉街頭風景和日常生活點滴。近期出版的第四本詩集《Dreaming Cities》(2016)，邀請讀者一同思考各種彷彿平常的相遇。

Janice Tsang

畢業於中大英文系，研究興趣包括後殖民理論和世界文學，熱愛詩詞和音樂。

出版

Libert Research Community · 本土研究社

由一群熱心關注本土發展及社會問題的研究者組成，建立具跨學科知識及在地視野的研究網絡，開拓各種自主獨立本土研究，推動民間知識生產與普及。

張島  
以前我們說普及和引介，現在我們說生產和建立思想網絡。仍是一個不合格的學習者，邊寫邊反省自己對待知識是否太輕率。希望可以在將來生產具批判力度的亞洲研究，尤其就城市化 and 殖民經驗的問題。

©2017 by 本土研究社  
All Rights Reserved

港幣 128 元

ISBN:978-988-14095-3-9



9 789881 409539

域內是否可能比所有內在世界更深邃？

正如域外比所有外在世界更遙遠？

—— 德勒茲 Gilles Deleuze